

美国使用武力的决定因素 (1946—2006)

陈 冲 刘 丰

内容提要 本文从国际危机行为数据库(ICB3.0)选取了1946至2006年美国所卷入的国际危机事件,用定量方法研究了美国二战后对外政策危机中使用武力行为的决定因素。文章对关于美国对外使用武力行为的四种解释模式进行了检验,并在此基础上将其综合为更全面的解释模型。作者发现,既有的四模式虽然能很好地解释美国使用武力,但不能提供一副完整的解释“图画”。作者认为,在决定美国对外使用武力的各种因素中,“实力差异”、“威胁程度”和“政治体制”等因素存在显著性的影响,而其他如“经济因素”、“国内政治需要”等则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性。

关键词 美国外交政策 使用武力 危机决策 定量分析

2009年12月1日晚,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西点军校对全国发表演说,宣布“为捍卫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调整美国对阿富汗战略,增派30000

《国际政治科学》2010/2(总第22期)第63—89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national Politics

名士兵以“集中力量打击反叛活动,保障主要人口聚集地的安全”。^①此政策甫出,褒贬之声不绝于耳。且不论奥巴马是否是为了转移国内民众日益不满的医改改革的注意力而提出一项临时方案,或为了弥补布什政府在过去几年因对伊拉克战争过度关注而致使阿富汗局势日渐恶化的结果,抑或为了其他更多的目标,奥巴马增兵阿富汗这一政策引出了本文要讨论的关于二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中一个有趣但却一直富有争议的问题:美国总统对外使用武力的原因究竟包括哪些?

说它有趣,是因为作为战后的超级大国,在处理对外政策危机时,美国总统本可采取多种应对方式,但却似乎更偏爱使用武力;^②说它负有争议,顾名思义则是因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见仁见智。那么,决定美国总统在对外政策危机中使用武力的因素是理想主义所标榜的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新马克思主义者所宣称的经济利益驱动,现实主义所推崇的以实力界定的国家安全利益,还是总统出于国内政治利益需要借对外使用武力来转移公众对其国内政策批评,抑或是这些要素综合的结果?

本文旨在分析美国对外政策危机中使用武力行为的决定因素。为此,我们检验了目前学术界关于美国对外政策危机中使用武力行为的四种解释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梳理出一个综合解释模型。全文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对既有文献进行回顾,着重梳理了学界对美国使用武力的四种解释模式——现实主义、帝国主义(经济利益)、理想主义和转移使用武力理论(国内政治利益);文章第二部分根据这四种模式提出了可验证的假设;第三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设计,包括对数据和变量的操作化;第四部分主要讨论本文的研究发现;最后对本文做一个总结。

一、四种解释模式

关于对外政策危机中使用武力的行为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当美国也卷

^① *The New York Times*, 2009年12月2日第一版。

^② 参考 James Meernik, “Presidential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Political Use of Military For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8, No. 1, 1994, pp. 121-138。

入其中时尤其如此。事实上,二战以后美国多次在海外用兵,其规模和频次超过了同时期任何一个国家。在众多关于美国动武的论著中,既有使用大样本统计方法研究美国在双边或多边行动中使用武力的条件,也有以历史分析、案例研究等方法分析美国动武的具体动因,包括电脑模拟等新的实验方法也被用来检验美国动武的假设,其他方法诸如形式模型也广泛地运用到美国对外政策危机中使用武力行为的分析中。^①

目前学界主要形成了四种关于美国对外使用武力的解释模式,它们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和假说。第一种模式基于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认为美国对外动武是基于其安全目标;第二种模式源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分析,强调了美国对外动武受经济利益的驱动;第三种模式则基于理想主义框架,认为美国对外使用武力是为了推广民主和人权等普世价值观念;第四种模式认为总统使用有限的军事武力是为了实现其国内政治目的,即所谓的转移使用武力。^②此外,其他关于美国在对外政策

^① 使用大样本统计方法研究美国对外动武的代表成果有: James Meernik, "Domestic Politics and the Political Use of Military Force by the United State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54, No. 4, 2001, pp. 889-904; Benjamin O. Fordham, "A Very Sharp Sword: The Influence of Military Capabilities on American Decisions to Use Forc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8, No. 5, 2004, pp. 632-656; Atsushi Tago, "Determinants of Multilateralism in US Use of Force: State of Economy, Election Cycle, and Divided Governmen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2, No. 5, 2005, pp. 585-604 等; 使用案例分析研究方法的代表成果有: Alex Mintz, "The Decision to Attack Iraq: A Non-compensatory Theory of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7, No. 4, 1993, pp. 595-618; David Brulé, "Explaining and Forecasting Leaders' Decisions: A Poliheuristic Analysis of The Iran Hostage Rescue Decis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6, No. 1, 2005, pp. 99-113 等; 使用实验方法的代表成果有: Alex Mintz, Nehemia Geva, Steven B. Redd, and Amy Carnes, "The Effect of Dynamic and Static Choice Sets on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An Analysis Using the Decision Board Platfor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3, 1997, pp. 553-566; Eben J. Christensen and Steven B. Redd, "Bureaucrats versus The Ballot Box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The Bureaucratic Politics Model and The Poliheuristic Theor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8, No. 1, 2004, pp. 69-90; Brad Podliska, "Taxonomy of Triggers for Unilateral or Multilateral U. S. Uses of Force: A Poliheuristic Interpretation,"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2006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Annual Convention, San Diego, California, March 22-25, 2006 等; 使用形式模型的代表成果有: Ahmer Tarar, "Diversionary Incentives and the Bargaining Approach to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0, No. 1, 2006, pp. 169-188; R. Harrison Wagner, *Wa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7) 等。

^② James D. Meernik, *The Political Use of Military Force in US Foreign Policy* (London: Ashgate, 2004), p. 1.

危机中使用武力的解释模式还有观众成本理论^①、政治生存理论^②、多元启发理论^③等具体的对外政策分析理论。本文接下来具体评述这些模式关于美国对外使用武力动因的解释。^④

第一种解释模式建立在政治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说之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国际体系是一个自助系统,因而体系中的每一个成员只能谋求自我保护,安全成为所有国家追求的首要目标。^⑤国家安全的保证源于国家的权力。尽管对权力的追求并不能增加国家的绝对安全感,甚至造成了安全两难,但不断增加的权力能够有利于实现国家的目的,“权力是国家自我保护最可靠的手段和国际关系中的最高仲裁”。^⑥在这种模式下,安全构成了国家对外行为的最高准则,国家支持谁,反对谁,皆属本国安全需要使然。因此,美国在国际危机中使用武力行为就可以用美国的安全利益以及其自身的权力来解释,而军事实力是构成了权力最重要的要素。根据这种逻辑,当美国的安全受到威胁并且自身的权力超过了其对手时,美国就会倾向于使用武力来保护其安全需要。例如本杰明·福德姆(Benjamin O. Fordham)发现,军事实力与使用武力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在国际危机中美国较之其对手拥有较大的军事优势时,决策者会更倾向于使用武力。^⑦除了对美国领土安全的威胁外,当美国公民

① 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考 Kenneth A. Schultz, “Looking for Audience Cost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5, No. 1, 2001, pp. 32-60; Joe Clare, “Domestic Audiences and Strategic Interests,”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9, No. 3, 2007, pp. 732-745。

② 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考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Alastair Smith, Randolph M. Siverson, and James D. Morrow, *The Logic of Political Survival* (Cambridge: MIT Press, 2003)。

③ 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考 David Brulé and Alex Mintz, “Blank Check or Marching Orders? Public Opinion and The Presidential Use of Force,”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Honolulu, Hawaii, March 1-5, 2005。

④ 秦亚青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梳理了前三种模式关于解释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的研究。他指出,这几种模式虽然根据政治现实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理想主义流派而设立,但并非与它们完全吻合,参考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一章;美国学者詹姆斯·密里克(James Meernik)分别用历史和统计方法检验了这四种模式,参考 James D. Meernik, *The Political Use of Military Force in US Foreign Policy* (London: Ashgate, 2004)。

⑤ 肯尼斯·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123页。

⑥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第40页。

⑦ 参考 Benjamin O. Fordham, “A Very Sharp Sword: The Influence of Military Capabilities on American Decisions to Use Forc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8 No. 5, 2004, pp. 632-656。

在海外的安全受到威胁时,总统最直接的考虑就是动用武力来保护本国公民安全。伊朗人质事件中,卡特总统排除了其他方案,而动用了特种部队解救人质。因为他将此事件视为对美国安全的一个直接威胁,虽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①在入侵巴拿马时,老布什政府给出的理由其中一个就是要保护在巴的美国公民的安全。^②但是这种安全解释模式却过于模糊,国家安全的含义过于宽泛。事实上,美国本土是相当安全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对美国没有真正的威胁。詹姆斯·密里克(James Meernik)指出,美国决策者常常以安全为由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而不是作为指导行为的准则,在1983年10月之前很少有美国人能够确定美国在格林纳达的安全利益,更不用说在地图上找到这个国家,但是里根总统却能将他的干涉定义为对来自古巴和共产主义在该地区对美国安全形成威胁的回应。^③

第二种解释模式也称“帝国主义模式”。它强调经济利益构成国家的最高利益,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内、对外政策的核心因素,也是这类国家对外干预的主要动因。^④它源于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由于战后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的影响而强化,强调帝国主义的政策为经济利益服务。国旗随贸易走的信条让我们相信财富与权力间存在着联系,经济利益确实在对美国的对外政策有重要影响。尽管并不是所有富裕的国家都是强大的,但是所有强大的国家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必定会是富裕的,因而它也必须时刻对那些威胁其经济增长或者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保持警惕。战祸常常因领土、资源和贸易而起。“在美国即使农民都明白,贸易关系如果没有适当的海军为后盾是很难维系的。”^⑤根据这种解释模式,经济利益在决定是否使用武力中占有重要地位。哈里·马格多夫(Harry Magdoff)研究了战后美国在世界范围的经济活动以及这类活动与美国对外军事行为的关系,指出美国战后军事干预的目的主要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

① 参考 David Brulé, “Explaining and Forecasting Leaders’ Decisions: A Poliheuristic Analysis of The Iran Hostage Rescue Decis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6, No. 1, 2005, pp. 99-113。

② Walter Lafeber, *The American Age: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t Home and Abroad*, 2nd edi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1994), p. 751.

③ James D. Meernik, *The Political Use of Military Force in US Foreign Policy*, p. 75.

④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第26页。

⑤ James D. Meernik, *The Political Use of Military Force in US Foreign Policy*, p. 76.

经济利益,其真正目的是经济扩张。^①国际关系学者运用经济工具,特别是统计分析对“二战”后的美国对外使用武力行为验证了部分支持了这种理论。同样有许多外交政策理论同样强调经济因素的重要作用。例如,基欧汉(Robert Keohane)、奈(Joseph Nye)、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吉尔平(Robert Gilpin)等人的著作也都强调了经济利益和经济问题在影响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重要作用,包括使用武力的行为。^②有时,这些目标与安全利益互相补充,正如在冷战中一样;在另一些时候,它们本身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如在美国内战前的那段时期,“经济利益为使用武力提供了必要和足够的条件”。^③但这种模式也存在一些局限,它无法解释美国许多重要的对外动武行为,因为它们有很多并不是发生在美国经济利益最集中的地方,何况美国政府和社会内部,本身存在着不同甚至是相互冲突的经济利益。这可能也是为什么用统计方法来检验经济因素对解释美国使用武力的结果时存在很大的争议的原因。^④

第三种模式源于理想主义思想。它强调了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标榜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石是传播民主和自由,推广人权等普世价值。美国人常常怀揣上帝选民的情节,不遗余力地宣传和推广其道德原则。根据理想主义原则,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支持民主力量,反对极权和专制势力。美国在二战后常常自诩为正义化身,二战后的许多对外干涉行为在意识形态的神话下都披上了崇高的外衣。^⑤在这种模式下,美国应该与邪恶势力对抗,对存在人道主义危机的国家介入干涉,哪怕不惜动用武力。这种观点最有影响的就是民主和平

^① Harry Magdoff, “The American Empire and the U. S. Hegemony,” in *Imperi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edited by Robert I. Rhode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0), p. 29. 转引自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第34页。

^② James D. Meernik, *The Political Use of Military Force in US Foreign Policy*, p. 77.

^③ Ibid., pp. 76-77.

^④ 可参考 Atsushi Tago, “Determinants of Multilateralism in US Use of Force: State of Economy, Election Cycle, and Divided Governmen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2, No. 5, 2005, pp. 585-604; James Meernik and Chelsea Brown, “The Short Path and the Long Road: Explaining The Duration of US Military Operation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4, No. 1, 2007, pp. 65-80。这些争议也见诸自由主义的贸易和平论中,参考 Edward D. Mansfield and Brian M. Pollins e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New Perspectives on An Enduring Debat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

^⑤ 关于美国对外干涉动机中意识形态因素的论述可参考:张睿壮《“人道干涉”神话与美国意识形态》,《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和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它们时常见诸总统的公共演讲和政策文件中。苏珊·沃纳(Suzanne Werner)发现国家之间争端常常起于两国的国内事务,“经常缘于一国对另一国的人权记录和政府组成形式的指责”。政体相似的国家间不易产生冲突,因为政治上的相似决定了管理国内事务的方式相似,这样它们就不会因国内事务而产生争端了。^①据此推测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应该是支持与其拥有相同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国家。但是,历史表明战后美国的多次干涉并非支持所谓的民主力量。50年代的南朝鲜,60年代的南越都不是所谓的民主国家,理想主义模式与美国实际的对外干涉行为并不吻合。^②甚至在冷战后,美国公众对于政府宣称的在海外促进民主、扩大人权的努力的支持和热情都有所下降。奥利·霍尔斯特(Ole R. Holsti)对此认为,美国政府在海外使用武力可能确实阻止了极权政府的侵犯人权行为,但是美国的努力却没有改变那些国家政府的本质。^③詹姆斯·密里克的研究同样证实了这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下,无论以何种方式来衡量民主程度的改变,冷战期间美国的军事干涉并没有提高民主的水平,大多数国家仍然保持原有的民主水平。^④因此,单纯从促进民主、推广人权的理想主义角度并不能很好的解释美国二战后在海外的动武行为。

第四种模式关注的是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对总统外交政策的影响。作为美国民选的总统,其获得政治连任的唯一途径就是赢得选举,因此他们非常重视国内民众对其支持率的变化。这种模式最有代表的是“转移使用武力理论”,该理论认为当国内问题恶化或者总统的支持率显著下降时,总统期望通过对外使用武力来转移国内关注的视线,以达到团结效应。它常常发生在选举年或者

① 参考 Suzanne Werner, “The Effects of Political Similarity on The Onset of Militarized Disputes, 1816-1985,”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53, No. 2, 2000, pp. 343-374.

②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第23页。

③ Ole R. Holsti, *Maki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204.

④ James Meernik, “U. S. Military Interven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Democracy,”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3, No. 4, 1996, pp. 391-402.

经济衰退或者总统的支持率显著下降时。^①在美国存在很强烈的主流共识,政治止于水边的原则使得美国人在面对外部威胁时往往能够团结一致,暂时搁置国内政治分歧。乔安妮·高娃(Joanne Gowa)发现,政治确实止于水边——在对外使用武力时,国内政治争论和政府内的党派分歧都暂时搁置了。^②与转移使用武力理论同样强调国内政治对总统对外动武的解释还有观众成本理论,多元启发理论以及政治生存理论,他们都将国内政治视为决策的本质。但问题是国内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使用武力呢?詹姆斯·密里克发现,“国内政治远不足以或不必然构成使用武力的条件。……它对使用武力没有决定性影响,除非是已经几乎得到授权进行的军事行动。”^③因此,单纯以国内政治并不能为完整地解释美国外交政策包括总统对外使用武力行为。

我们回顾了四种关于美国在外交政策危机中使用武力行为的解释模式,它们根据不同的理论思想提出了不同的假设和解释。然而,每一种都存在着相应的不足,至少都不能提供一种连贯和完整的解释。但它们却可以相互补充,同时也相互竞争。可以相信,每一种特定的模式在解释一个特定案例时相对于其他模式更有说服力。例如,许多现实主义者和新现实主义可能会否认总统的公众支持率是使用武力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依附论者可能会认为经济帝国主义主导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因而贬低其他因素的作用。因此,对美国外交危机中使用武力行为的解释需要将这四种模式结合起来评估以获得更为全面的解释。事实上安全、实力、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国内政治目标等因素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常常交织在一起。接下来,我们将根据这四种模式

① 关于转移使用武力的研究可参考: Benjamin Fordham, “The Politics of Threat Perception and The Use of Force: A Political Economy Model of U. S. Uses of Force, 1949-1994,”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2, No. 3, 1998, pp. 567-590; Karl DeRouen, Jr., “Presidents and the Diversionary Use of Force: A Research Not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4, No. 2, 2000, pp. 317-328; James Meernik, “Domestic Politics and the Political Use of Military Force by the United State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54, No. 4, 2001, pp. 889-904; David Sobek, “Rallying Around the Podesta: Testing Diversionary Theory Across Tim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4, No. 1, 2007, pp. 29-45; Dennis M. Foster And Glenn Palmer, “Presidents, Public Opinion, and Diversionary Behavior: The Role of Partisan Support Reconsidere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2, No. 3, 2006, pp. 269-287 等。

② Joanne Gowa, “Politics at the Water’s Edge: Parties, Voters, and the Use of Force Abroa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2, 1998, p. 307.

③ James D. Meernik, *The Political Use of Military Force in US Foreign Policy*, p. 203.

的基本观点,推导出我们关于美国在对外政策危机中动武决定因素的可验证性假设。

二、美国对外使用武力行为的相关假设

因为本文的目的在于验证美国在外交政策危机中使用武力行为的决定因素,探究这些不同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动武行为,所以我们的分析主要根据既有研究成果对其解释并综合可能的影响因素加以检验。根据前面的梳理,我们设计了以下11个假设来检验决定美国在对外政策危机中对外使用武力行为的因素。

假设1和假设2是关于第一种解释模式的两个核心假设。标准的现实主义者对冲突的评估会将实力对比作为最重要的因素纳入考虑之中。根据政治现实主义思想,国家不太可能向比自己力量强大的对手发动军事进攻。^①既然安全在现实主义看来是国家最重要的目标和利益,那么当对其安全的威胁越大时,国家拥有的其他选择余地就会越小,而武力可能是最有效的应对方式。

假设1:当对手与美国权力悬殊越大时,总统会越倾向于使用武力。

假设2:当危机对美国安全威胁越大时,总统会越倾向于使用武力。

假设3和假设4是关于第一种解释模式的两个具体假设,便于我们探究影响美国动武的具体因素。美国总统是否会对不同类型的外交政策危机而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我们感兴趣的是总统对于军事和战略层次的危机是否会更倾向于使用武力,而对于文化、经济类型的反应方式是否会有所不同。^②同样,对于发生在不同地域的外交政策危机,总统的应对方式是否会有差别呢?卡伦·拉斯勒(Karen Rasler)和威廉·汤普逊(William R. Thompson)检验了在大国主导的体系内,空间和地域因素对冲突升级的影响,他们发现邻国间为相邻

^① Karl DeRouen Jr. and Christopher Sprecher, "Initial Crisis Reaction and Poliheuristic Theor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8, No. 1, 2004, p. 63.

^② Karl DeRouen Jr. and Christopher Sprecher, "Initial Crisis Reaction and Poliheuristic Theory," p. 62.

的空间而争夺,而非邻国有时则加入到这些持续的战争中。^①从历史经验中我们知道,邻近的两国比不相邻的两国更容易发生军事冲突。根据现实主义理论,我们试图考察地域因素对于美国总统决定使用武力行为的影响。

假设 3: 当危机属于军事—战略层次时,总统会越倾向于使用武力。

假设 4: 当危机发生在美国临近地域时,总统越倾向于使用武力。

根据帝国主义扩张模式的解释,美国对外政策受其经济利益的驱使,那么美国最有可能在它拥有最大投资机会,拥有最关键的海外市场,拥有最重要原料基地的地方使用武力。^②因此我们设计假设 5 和假设 6 作为检验第二种模式的核心假设。因为美国在海外的经济利益与其在当地的投资和援助息息相关,因此我们期望当在这些国家发生危机时,美国总统会更倾向于使用武力来保护其经济利益。同样,美国在海外的另一个重要经济利益就是保障其海外石油供应。因此,我们期望当美国与其石油输入国发生危机时或者危机行为体涉及石油输入国时,总统会更倾向使用武力解决危机。^③

假设 5: 当美国在危机发生地存在的经济利益越大时,总统会越倾向于使用武力。

假设 6: 当危机发生在美国的主要石油输入国时,总统会越倾向于使用武力。

第三种理想主义模式强调美国对外动武的意识形态因素,是为了促进民主和保护人权。特别是“二战”后,美国对外用武常常被贴上人道主义干涉的标签。^④根据第三种模式,对于与美国拥有相似价值观念(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的国家,美国采取会支持行为而不会对其使用军事手段。如果美国对手是一个极权国家或者存在人道灾难,美国就会积极干涉,甚至不惜使用武力。我们

① 参考 Karen Rasler and William R. Thompson, “Explaining Rivalry Escalation to War: Space, Position, and Contiguity in the Major Power Subsyste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4, No. 3, 2000, pp. 503-530。

②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第 34 页。

③ James D. Meernik, *The Political Use of Military Force in US Foreign Policy*, p. 114.

④ 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考 John Janzkeovic, *The Use of Force in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Morality and Practicalities* (London: Ashgate 2006)。

设计假设7和假设8来检验第三种模式,其中假设7也可以作为检验民主和平论的假设,即当外交政策危机中包含民主国家时,美国不太可能使用武力。

假设7:当对手与美国的政治体制相差越大时,总统会越倾向于使用武力。

假设8:当对手国内社会越动荡,总统会越倾向于使用武力。

最后一种模式强调了国内政治对总统使用武力的影响。根据转移使用武力理论的研究,总统通常在国内情况出现恶化时,通过对外使用武力来转移国内民众视线,制造团结效应以达到巩固其统治或者赢得选举的政治目的。遵循既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强调了经济指标、总统的支持率以及选举因素,为此我们设计了假设9、假设10和假设11来检验国内政治因素对总统对外使用武力行为的影响。^①

假设9:当国内经济衰退越大时,总统会越倾向于使用武力以转移国内视线。

假设10:当总统在国内的支持率明显下降时,总统会越倾向于使用武力以达到“团结”效应。

假设11:当危机发生在选举年内时,总统会越倾向于使用武力。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美国1946—2006年卷入的对外政策危机事件中使用武力的情况,用大样本统计方法来验证上述假设。我们感兴趣的是哪些因素以及在它们多大程度上影响总统对外使用武力。

三、新的解释

我们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际危机行为(International Crisis Behavior Project,

^① 这三个假设设计来源于转移使用武力理论的基本假设。具体可参考 Karl DeRouen, Jr., “Presidents and the Diversionary Use of Force: A Research Not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4, No. 2, 2000, pp. 317-328; James Meernik, “Domestic Politics and the Political Use of Military Force by the United State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54, No. 4, 2001, pp. 889-904。

ICB3.0) 数据库。^① ICB 将危机分为体系层面的危机(宏观 ICB1) 和行为体层面的危机(微观 ICB2) 两种类型。由于我们研究对象是国家行为体,因此我们使用后一种类型的相关数据。值得特别说明的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并不是美国在海外的所有使用武力行为,我们关注的是美国在“对外政策危机”中使用武力的行为。在此类型危机决策中,当决策者认为:1) 基本的价值观受到威胁;2) 在限定的时间必须做出反应以及卷入军事敌对的几率大增,一项外交政策危机就发生了。^②在 ICB2 数据中,有一个变量“美国干预”——任何口头的或是物质的行动来支持或是反对某个危机行为体——来专门定义美国卷入的国际危机,其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美国作为国际危机的直接当事者(比如,古巴导弹危机),另一类则是美国作为间接参与者卷入(比如,1958 年的台海危机)。^③因此我们按照这类关于美国干预的定义最终得到了 241 个国际危机观测数据。

(一) 因变量: 使用武力

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国际危机都与美国或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相关,这是冷战的大背景。就美国对外政策决策而言,对于一项危机,美国总统可以采取很多种应对方式,例如口头谴责、经济制裁、威胁使用武力,同时也可以调动和使用武力,发动秘密军事行动,直接的空袭以及入侵等,但总体上来说可以分为两类:武力和非武力。ICB2 数据库对于一项国际危机的应对方式包含九种。^④为了验证我们的假设,我们将反应方式简化为两种:使用武力和不使用武力。

^① 国际危机行为(ICB 3.0) 数据库收录了 1918—2006 年间的国际危机危机事件,最近的一次更新 ICB3.0 是 2009 年 1 月。另一种关于美国使用武力行为的数据库是国家间军事争端(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 MID)。虽然后者涉及美国对外使用武力次数比 ICB 更多,但 ICB 关注的外交危机事件能够让我们对外交政策的环境加以控制,并且它同样收录了大量美国外交危机中使用武力的事件,其多样的变量设计也是 MID 无法比拟的,这是选择它的重要原因。ICB 数据来源于 <http://www.cidem.umd.edu/icb/data/icb2v9.zip>。

^② Patrick James and Enyu Zhang, “Chinese Choices: A Poliheuristic Analysis of Foreign Policy Crises, 1950-1996.”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1, No. 1, 2005, p. 39.

^③ ICB 中的这一变量包括 8 个层次,其中 1 指美国没有卷入,2—8 指美国以不同的方式间接卷入,9 则为美国作为危机行为体直接卷入。

^④ ICB2 的九种主要反应方式分类分别为:没有行动、口头行动(如抗议、谴责等)、政治行动(如断绝外交关系等)、经济行动(经济制裁、禁运等)、其他非武力行动、非暴力的军事行动(宣示武力等)、多边的非暴力军事行动、军事暴力和多边军事暴力行动。

我们将第一类美国作为直接危机行为体并且采取反应方式为8或9,即军事暴力、多边军事暴力行动的赋值为1;将第二类美国间接卷入国际危机中使用8,即直接军事行动也赋值为1,其余为0。根据这两种数据,因变量反映了美国在外交政策危机中使用武力的情况。

(二) 自变量

ICB2数据库中有许多关键变量可以解释危机决策,然而我们关注的是能够反映美国在外交政策危机中使用武力行为的影响因素的变量。根据前文对四种模式的梳理和我们设计的相关假设,我们设计出以下变量来分别验证这些模式及假设。

(1) 权力差异

这是标准的现实主义变量。如果危机当事方的权力处于均衡状态,那么任何一方在考虑使用武力时都需要谨慎。冷战期间,美苏双方几乎没有一次直接的军事对抗。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实力上的考虑是最重要的原因,毕竟谁都没有取胜的把握,而一场结果不确定的军事对抗代价太大。因此,总统在决定是否使用武力时,危机另一方的实力将是重点考虑的因素,这种理性计算能够保证国家取得最大的成功。ICB2中使用了权力差异这一变量来衡量危机行为主体的实力差异。它由双方的人口规模、国内生产总值(GNP)、领土大小、同盟的实力、军费开支以及核能力计算而出。

(2) 威胁程度

美国对外动武的第一种解释模式强调了安全因素在对外使用武力中的重要地位。由于安全的定义过于宽泛,不便于操作化,我们将此变量转化为该事件的威胁程度。ICB2中包含威胁严重度这个变量用来衡量危机事件的威胁,它包括8个层次。为了进一步验证安全因素的重要程度,我们将ICB中对政治、军事、领土和生存的威胁作为衡量对美国安全最重要的威胁并赋值为1,其余为0。^①

^① ICB2对危机威胁严重度的8个层次分别为:经济威胁(如将石油特权给予敌对方)、有限的军事威胁(如以色列对恩德培的突袭)、政治威胁(如威胁统治者的权力、政治体制等)、领土威胁(如威胁领土完整等)、威胁影响(如国际声誉等)、严重损害(如巨大伤亡等)、威胁生存(如威胁人民的生存或在殖民地的存在等)以及其他。

(3) 国际影响

作为总统,他们会关心美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例如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威望等。在威胁严重度中有威胁影响这一赋值。如果在威胁严重度中定义了对影响的威胁,并且行为体为超级大国(美国或苏联),ICB2中专门认定了对大国国际影响的威胁这一变量来定义对影响不同类型的威胁。综合这两个变量,我们将威胁美国国际影响的危机事件赋值为1,不威胁影响的则为0。^①

(4) 危机类型

我们用此变量来检验美国对于何种类型的危机更倾向于使用武力解决。ICB2认定了对危机问题这一变量来定义不同类型的危机问题。它包含4个层次的问题,我们将安全层次赋值为1,其余为0。^②

(5) 危机地域

卡伦·拉斯勒和威廉·汤普逊的研究已经表明了地域因素对于两国,特别是邻国之间军事冲突具有显著性的影响。我们用“危机地域”这个变量来检验地域因素是否会影响美国在对外政策危机中使用武力行为。ICB2有三个变量——危机行为体的地理位置、危机发生的地理位置和危机行为体与危机发生地距离——来定义地域因素对国际危机事件的影响。但因为美国本身独特的地理位置,它在二战后几乎没有与其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有军事冲突,所以我们选取危机发生的地理位置来分析地域因素对美国动武的影响。但ICB2对此的区分达20个之多^③,这样就不便于我们统计分析。因此,我们根据通用的地理分区将其重新赋值,分别为北美、拉美、澳洲、欧洲、亚洲和非洲。

(6) 美国对外援助国家

帝国主义解释模式强调了动武的经济利益因素。对于战后美国给予巨大经济援助的国家,美国在其经济利益一般较大。^④如果这些国家发生危机或者

① ICB2中这一变量包括了在威胁严重度中没有赋值的事件以及赋值为威胁影响的事件。这样将对政治和外交的威胁分别区分。

② 这4个层次的问题分别是:军事安全(1934—1936年的英国和埃塞俄比亚战争)、政治外交(委内瑞拉和古巴1963年的危机)、经济发展(约旦1964年的约旦河危机)、文化状态(1938年德国对奥地利吞并)。

③ ICB2中这20个区域为:中亚、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西非、北非、东非、南非、中非、欧亚、东欧、中欧、西欧、北欧、南欧、北美、中美、南美、澳洲。

④ James D. Meernik, *The Political Use of Military Force in US Foreign Policy*, p. 114.

出现动乱可能就会更倾向使用武力来维护其利益。因此我们用美国对外经济援助国家这一变量来检验假设 5。^①

(7) OPEC 国家

随着美国对海外石油依赖的加强,美国采取了许多措施来保证充足的海外石油供应。1991 年的海湾战争和 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让世人首先联想到的原因便是美国对该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的觊觎。在国际石油市场中,OPEC 国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为了保障其稳定的石油供应,维持其经济利益,当这些产油国出现危机或者与美国关系交恶时,美国很有可能采取军事行为来解决危机。^②因此,我们将危机中包含 OPEC 国家赋值为 1,其余为 0。

(8) 政治体制

理想主义模式强调了美国动武原因中的意识形态因素,认为美国动武的是为了促进民主和人权,维护世界的正义和平。根据民主和平论的观点,民主国家间很少通过武力来解决争端。当然这些研究至今还存在争论,例如非民主国家之间也很少通过武力来解决争端。^③因此,我们用政治体制变量来验证假设 7。ICB2 中变量危机行为体政治体制定义了 5 种类型的体制,为便于我们的统计分析,我们将民主政体赋值为 1,非民主政体赋值为 0。^④

(9) 社会动荡

根据理想主义的解释模式,美国动武的另一个因素是要拯救那些国内动荡或者出现人道主义灾难国家的人民。我们用 ICB2 中的变量社会动荡来验证假设 8。我们将存在社会动荡的赋值为 1,正常水平视为稳定并赋值为 0。^⑤

^① 数据来源于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美国海外援助项目数据,见 <http://gbk.eads.usaidallnet.gov/>。

^② OPEC 国家组织成立于 1960 年,虽然我们的分析时段是 1946—2006 年,我们仍然采取这一变量。因为在 1960 年前,石油的问题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并不是重点,直到 1973 年石油危机后,才逐渐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变得重要。我们的赋值从该成员加入当年开始,OPEC 成员国家数据来源于 <http://www.opec.org/home/>。

^③ 例如苏珊·沃纳发现政体相似的国家之间(民主国家和民主国家,非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通常也不轻易使用武力来解决分歧,参考 Suzanne Werner, "The Effects of Political Similarity on The Onset of Militarized Disputes, 1816-1985," pp. 343-374。

^④ 这 5 种类型分别是:民主政体、文官独裁政体、直接军事统治、间接军事统治和军事独裁政体。

^⑤ ICB2 中社会动荡变量定义了 4 个层次:在危机之前的相对时期内显著增加、正常水平、显著下降以及新独立的国家。我们将“正常水平”作为视为稳定,其他视为存在动荡。

(10) 公众支持率

总统用来考量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就是公众对其政策的支持,确认公众支持率最常用的方式就是民意测验。在民主国家,领导者要保持政治上生存唯一的方式就是赢得选举,而如果候选人不受公众的欢迎是很难获胜的。^①我们采用盖洛普的民意测验数据作为公众支持率的指标。这个数据包括了1937年以来盖洛普对美国公众所做的关于总统支持度的所有测验结果。测验的问题基于“你是否同意×××作为总统处理其工作的方式?”但由于总统的支持率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单独的一个统计数据不能表明支持率的上升或下降,因此我们又计算出了变化支持率以区别与总体支持率。变化支持率是危机发生了但总统还没有做出决策的时民意测验数据与决策之后的数据之间的差值。考虑到危机的发生具有偶然性,并不是所有的危机之前、之后都有这样的统计数据。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使用两次距离最近的民意测验数据作为代替。^②

(11) 经济指标

转移使用武力理论,当国内经济情况较差时,总统可能会更容易采取武力以转移国内民众注意力,进而提高其支持率。我们对经济情况的指标有三个:GDP季度增长率,月通货膨胀率(CIP)和失业率。由于危机发生的时间较短,使用月和季度统计数据会比年统计数据更可靠。^③

(12) 选举年

许多关于选举和总统使用武力的相关性研究成果表明,总统在选举年会更倾向于使用武力,以此表明总统的强硬立场以及维护国家利益的决心,从而达

① 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考 Philip Everts and Pierangelo Isernia ed., *Public Opin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Use of For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David Brulé and Alex Mintz, "Blank Check or Marching Orders? Public Opinion and the Presidential Use of Force,"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Honolulu, Hawaii, March 1-5, 2005。

② 盖洛普的数据只有会员才能使用,然而 Roper Center 免费提供了盖洛普的所有民意测验数据,数据见 <http://roperweb.ropercenter.uconn.edu/>。

③ 经济数据来源于美国贸易部和劳工部统计网站,参考 <http://www.bls.gov/>和 <http://www.bea.gov/>。

到赢得公众选票和选举的目的。^①美国每两年的国会中期选举和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成为决策者赢得或者维持权力的最重要途经。虽然危机决策是由总统做出,与国会选举关系不大,但我们知道总统的政策受限于国会,“府会一致”的情况有助于总统政策执行,因此从党派因素考虑我们也将国会中期选举考虑进来。当危机发生在选举年的7、8、9、10月时,我们赋值为1,其余为0。

(三) 模型

遵循以往的研究成果,我们也分别用4个模型来验证前文总结的四种解释模式^②,然后在此基础上,综合这些要素为一个综合模型。

模型 I: 使用武力 = $B_0 + B_1$ 权力差异 + B_2 威胁程度 + B_3 国际影响 + B_4 危机类型 + B_5 危机地域

模型 II: 使用武力 = $B_0 + B_1$ 经济援助 + B_2 OPEC 国家 + B_3 GDP 增长率 + B_4 通货膨胀率 + B_5 失业率

模型 III: 使用武力 = $B_0 + B_1$ 政治体制 + B_2 社会动荡 + B_3 国际影响

模型 IV: 使用武力 = $B_0 + B_1$ 公众支持率 + B_2 支持率变化 + B_3 GDP 增长率 + B_4 通货膨胀率 + B_5 失业率 + B_6 选举年 + B_7 社会动荡

模型 V: 使用武力 = $B_0 + B_1$ 权力差异 + B_2 威胁程度 + B_3 国际影响 + B_4 危机类型 + B_5 危机地域 + B_6 经济援助 + B_7 OPEC 国家 + B_8 政治体制 + B_9 社会动荡 + B_{10} 公众支持率 + B_{11} 支持率变化 + B_{12} GDP 增长率 + B_{13} 通货膨胀率 + B_{14} 失业率 + B_{15} 选举年

^① 选举期为选举年的7、8、9、10月,这时两党的候选人最终确定。参考 James Meernik, “Modeling International Crises and the Political Use of Military Force by the USA,”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7, No. 5, 2000, p. 554.

^② 这种回归模型的采用可参考 Karl DeRouen, Jr., “Presidents and the Diversionary Use of Force: A Research Note,” pp. 322-323; Karl DeRouen Jr. and Christopher Sprecher, “Initial Crisis Reaction and Poliheuristic Theory,” pp. 63-64.

四、研究发现和讨论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探究美国在外交政策危机中使用武力行为的决定因素。根据 ICB2 对国际危机的定义以及美国所卷入的危机,我们首先对因变量进行简单的描述。图-1 展示了从 1946—2006 年间,11 位美国总统任期内所卷入的国际危机事件以及使用武力的情况。在美国所卷入的 241 个国际危机中,美国作为危机直接当事者的危机有 61 个,占 25.3%,针对危机使用武力次数为 29 次,占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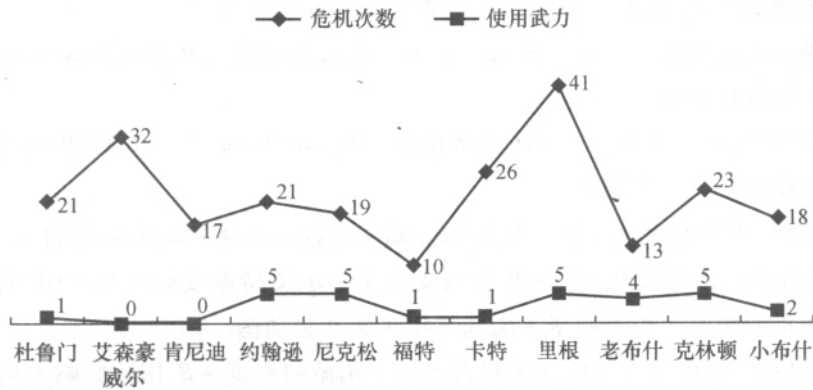


图-1 美国卷入国际危机和使用武力统计(1946—2006)

为便于我们更好地检验决定美国使用武力的因素,接下来对我们选取验证假设的变量进行简单的描述性分析。表-1 显示了对本文中所有的逻辑变量的一个简单统计,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初步验证我们之前提出的一些假设并展示出一些有意思的发现。我们发现,在这 241 个美国卷入的国际危机中,军事安全的类型达到 153 次,占 63.5%,但美国使用武力的次数仅为 29 次。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总统即使面临军事安全方面的威胁也很谨慎甚至在克制使用武力呢?同样,对于其安全程度的威胁也达到 100 次,这是否对第一个解释模式提供了相反的结论呢?我们下文将具体分析这些原因。

表-1 逻辑变量的描述统计

使用武力	武力(29)			非武力(212)		
	12%			88%		
危机类型	军事(153)			非军事(88)		
	63.5%			36.5%		
威胁程度	安全(100)			非安全(141)		
	41.5%			58.5%		
国际影响	威胁影响(87)			其他(154)		
	36.1%			63.9%		
OPEC 国家	是(13)			不是(228)		
	5.4%			94.6%		
政治体制	民主(121)			非民主(120)		
	50.2%			49.8%		
社会动荡	存在(72)			不存在(169)		
	29.9%			70.1%		
危机地域	北美(1)	拉美(32)	澳洲(0)	欧洲(33)	亚洲(117)	非洲(58)
	0.4%	13.3%	0%	13.7%	48.5%	24.1%

同样,我们发现对于美国存在重要经济利益的国家,美国卷入与其相关的危机并不多,虽然 OPEC 组织成立于 1960 年且成员国并不多,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们与美国存在重要的经济联系。上面的统计结果对于第二个模式的解释提出的经济利益是驱使美国动武的主要原因有何解释呢?有意思的发现是,在这 241 个美国卷入的国际危机中,民主国家的数量超过了非民主国家,这对于第三种解释模式以及民主和平论是否提出了相反的证据呢?从危机发生的地域看,美国卷入的发生在亚洲的国际危机远远超过了世界其他地方,这恰似冷战期间美苏形成的亚洲热战、欧洲冷战格局。这些问题我们将在后面的相关分析和逻辑回归分析部分进行解答。

表-2 是我们对本文进行回归分析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值得说明的是,变量“经济援助”是美国对危机中当事国的援助总和,从 1946—2006 年它的统计包括四个阶段:1946—1948 年间战后恢复援助、1949—1952 年的马歇尔计划、1953—1961 年间美国《共同安全法》(Mutual Security Act)援助和 1962 年后的《援外法案》阶段。因此,我们并不能获得某次危机当年的援助数据,而只能以一个时间段的数据作为该年美国经

否存在共线性问题 接下来我们讨论变量之间的皮尔森(Pearson) 相关程度。

表-2 对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使用武力	0. 1203	0. 32603
权力差异	6. 14	16. 614
威胁程度	0. 4149	0. 49374
国际影响	0. 6390	0. 48129
危机类型	0. 6349	0. 48247
危机地域	4. 6888	1. 24442
经济援助	1. 2767E2	242. 04188
OPEC 国家	0. 0539	0. 22637
政治体制	0. 5021	0. 50104
社会动荡	0. 2988	0. 45866
公众支持率	54. 97	13. 143
支持率变化	0. 20	4. 688
GDP 增长率	3. 8220	4. 08025
通货膨胀率	77. 5324	53. 90458
失业率	5. 7189	1. 58042
选举年	0. 1452	0. 35306

本文使用 SPSS16.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表-3 显示了本文自变量间的相关程度。我们发现变量之间没有存在共线性问题。^① 通过表-3 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判断权力差异、威胁程度、国际影响、危机类型、通货膨胀率等变量对于总统在危机中决定使用武力行为有显著性的影响。在接下来的回归分析中,我们将确定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在对外政策危机中使用武力的决定。

^① 对国际影响的威胁是 ICB2 专门针对二战后的两国超级大国设定的变量,尽管它威胁程度的相关系数达 0. 615,但仍小于国际通用的 0. 8 水平,因此我们仍然可以将其作为观测变量。

表-3 变量间的相关分析(1946—2006)

	权力 差异	威胁 程度	国际 影响	危机 类型	危机 地域	经济 援助	OPEC 国家	政治 体制	社会 动荡	公众 支持率	支持率 变化	GDP 增长率	通货 膨胀率	失业率	选举年
权力差异	1														
威胁程度	-0.323**	1													
国际影响	-0.451**	0.615**	1												
危机类型	-0.268**	0.271**	0.435**	1											
危机地域	-0.119	-0.047	0.013	0.060	1										
经济援助	0.016	-0.018	0.136	0.087	0.124	1									
OPEC 国家	-0.107	0.097	0.141*	0.028	0.104	-0.145	1								
政治体制	0.342**	-0.374**	-0.420**	-0.118	-0.176*	0.100	-0.240**	1							
社会动荡	-0.108	0.168**	0.189**	0.024	-0.063	0.119	-0.076	-0.093	1						
公众支持率	0.051	-0.018	-0.034	-0.101	-0.029	0.069	0.015	-0.023	-0.003	1					
支持率变化	-0.030	-0.030	0.013	-0.017	0.036	0.012	0.108	-0.096	0.061	0.185**	1				
GDP 增长率	0.167*	-0.143*	-0.173**	-0.037	0.055	-0.016	0.036	0.010	-0.098	0.006	0.056	1			
通货膨胀率	0.011	-0.025	0.167**	0.250**	0.140*	-0.009	0.074	0.012	-0.168**	-0.053	-0.016	-0.132	1		
失业率	-0.087	0.013	0.065	0.025	0.126	-0.079	0.187**	-0.103	-0.009	-0.072	0.079	0.077	0.247**	1	
选举年	-0.003	-0.156*	-0.058	-0.054	-0.020	0.080	0.058	0.057	-0.037	-0.091	-0.098	-0.020	0.029	-0.091	1

注: N=241; *** p<0.001; ** p<0.05; * p<0.1 (双尾检验)。

因为在我们的模型中因变量为 0-1 二分变量, 我们的统计分析采用 Logistic 二项逻辑回归分析。我们对所有自变量采取强制进入回方程的方式进行统计, 结果见表-4。从总体上看, 我们发现关于美国对外使用武力解释的第一种模式(模型 I) 在统计上得到了显著性支持, 而我们统计分析结果并没有很好地支持第四种解释模式(模型 IV)。同时我们发现在解释美国对外动武的变量中, 权力差异、威胁程度、政治体制、社会动荡在我们的模型中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而经济因素基本上没有得到统计上的支持。

表-4 对美国动武行为的二项逻辑回归分析(1946—2006)

变量	模型 I	模型 II	模型 III	模型 IV	模型 V
权力差异	0.056 *** (0.017)				0.051 ** (0.019)
威胁程度	-0.987 ** (0.599)				-0.373 (0.660)
国际影响	-0.066 (0.591)		-0.685 (0.454)		-0.465 (0.354)
危机类型	-0.868 * (0.401)				-0.250 (0.472)
危机地域		0.049 (0.186)			-0.109 (0.173)
经济援助		-0.004 * (0.002)			-0.002 (0.001)
OPEC 国家		0.058 (0.824)			0.764 (0.867)
政治体制			1.702 ** (0.587)		1.360 ** (0.605)
社会动荡			1.222 * (0.644)	1.313 ** (0.638)	1.359 ** (0.667)
公众支持率				0.015 (0.017)	-0.009 (0.062)
支持率变化				0.034 (0.042)	0.286 * (0.170)
GDP 增长率		0.079 (0.055)		0.082 (0.058)	0.304 (0.211)
通货膨胀率		0.007 (0.004)		0.006 (0.004)	0.020 (0.020)
失业率		0.008 (0.140)		0.046 (0.142)	0.681 * (0.388)
选举年		0.398 (0.559)		0.404 (2.338)	
截距	-2.381 ** (1.016)	-2.683 ** (0.936)	-2.562 *** (0.604)	-3.756 ** (1.512)	-2.992 ** (1.806)
-2Log likelihood	151.245	161.685	150.315	153.233	137.092

注: $N = 241$; *** $p < 0.001$; ** $p < 0.05$; * $p < 0.1$ (双尾检验) 括号内为标准差。

在模型 I 中, 权力差异通过了置信水平为 99% 的显著性检验, 这有力地支持了我们的假设 1, 即当危机另一方与美国的实力差距越大时, 总统就越倾向于使用武力解决冲突。有趣的发现是“威胁程度”通过了 95% 的显著性检验, 但其回归系数为 -0.987, 这表明, 威胁程度对于美国总统使用武力具有负面影响。换言之, 我们的假设 2 得到反向的支持: 对于美国安全威胁越大的危机, 总统在动用武力时会越谨慎。与此相应的是危机类型对于使用武力也有负面的显著性影响。这是否意味着第一个模式的解释没有得到支持呢? 恰恰相反, 这样的结果同样支持了现实主义的解释模式。我们知道, 现实主义强调实力和安全的理性计算权衡的结果。如果使用武力的代价太大, 这种方案就不太可能会被决策者采纳。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 241 个美国卷入的国际危机中,

军事安全的类型达到 153 次,但美国使用武力的次数仅为 29 次。例如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苏联对美国安全威胁可以说是冷战期间最大、最直接的一次,即使对美国的威胁如此严重,肯尼迪总统还是谨慎地选择了封锁战略而不是空中打击或者入侵等可能挑起美苏兵戎相见或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方案。这就是一种理性的战略,对于肯尼迪总统来说,即使其海军官员强烈支持使用武力、采取空袭等强硬手段,但由于代价太大而被排除。^①由于这三个关键变量都通过了较高水平的统计检验,第一个解释模式也因此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在模型 II 中,我们的经济因素变量均没有得到显著性的支持。尽管经济援助通过了置信水平为 90% 的假设检验,且整个模型的拟合度(-2 Log likelihood)达到我们五个模型中最高(161.685),我们统计结果并没有强有力地支持第二个解释模型。第一,正如前文描述统计结果发现的一样,对于美国存在重要经济利益国家(石油输入地),美国卷入的危机很少(5.4%),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第二,其他国内经济指标在模型 II 中都没有通过检验。第三,我们认为拟合度之所以最高,很可能是我们得到的经济援助数据是按时段统计的结果。例如对于 1949—1952 年马歇尔计划期间发生的危机,我们得到的数据仅是这一阶段所有援助的总和,1949 年对希腊的经济援助和 1952 年对它的援助都是按照这个阶段的总数计算的。虽然,我们无法获得具体危机期间的经济援助数据,但是一段时间内美国对该国的经济援助数量同样可以反映出美国的经济利益,这也是我们保留这个观测变量的最要原因。总体而言,对美国对外使用武力的经济利益解释并没有得到我们统计结果的有力支持。^②这个问题在结论部分将进一步讨论。

在模型 III 中,我们看到政治体制变量通过 95% 的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为 1.702,我们的假设 7 因而得到了有力的支持。^③同样,社会动荡变量也通过置信水平为 90% 的假设检验。我们由此可以确定模型 III 得到了有力的支持。这确定了一个事实:在我们选取的外交政策危机中,美国倾向于对与其政治制

^① 参考 Graham T. Allison and Philip Zelikow,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2nd editio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② 在密里克的研究中,经济利益驱动说在统计分析中也同样没有得到有力的支持。参考 James D. Meernik, *The Political Use of Military Force in US Foreign Policy*, p. 115。

^③ 使用武力与政治体制的相关系数为 0.266(95%)。

度相差较大以及国内社会处于动荡的国家使用武力。而且从表3中我们发现政治体制与社会动荡两个变量并不存在显著性的相关性(0.093)。在前面我们提到241件美国卷入的国际危机中,民主国家的数量超过了非民主国家。我们认为,尽管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可能的一种解释是我们的数据来源于ICB,这个数据库关注的是国际危机,尤其是外交政策危机,如果我们按照沃尔兹的逻辑,相互依赖度高的国家容易发生冲突,因为交往的频繁增加了冲突的可能性^①。美国与自己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交往更多,这点就可以得到解释了。

我们发现第四种解释模式并没有得到有力的支持。转移使用武力理论强调的国内政治因素,如总统的支持率、国内经济运行情况以及选举等对使用武力的影响在我们的模型IV中都没有通过显著性假设检验。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在使用武力时,总统对于自己的支持率以及选举不重视呢,对于国内民意测验视而不见呢?事实上,对于总统来说,民意测验只是一种表达民意的工具,至于其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影响究竟如何则一直存在争议。^②不同总统看待民意测验的态度也存在很大差异,而这又和总统的性格有关。对于民意测验,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一位幕僚这样说:“没有哪一位总统有责任遵从民意的指示。……他有责任尊重民意,并以此来引导它——塑造它,告知它,拉拢它,并且战胜它。民意既是他的罗盘,又是他的刀剑。”^③正如乔纳森·凯勒(Jonathan W. Keller)和杨毅(Yi Edward Yang)所指出,“领导者的观念、个性以及决策背景对其决策都有重要影响”,而这点常常在理性主义分析中被忽视。^④然而对于变量“选举年”,我们发现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事实上,对于这11位美国总统他们最长的任其不超过两届,而在“选举年”(包括国会中期选举)发生的危机事件占14.5%,这意味着在我们的观测数据中,选举因素对于模型的检验不够充分。同样,我们发现经济指标——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以及失业率

① 肯尼斯·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85页。

② 参考 Ole R. Holsti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s to the Almond-Lippmann Consensus Merston Series: Research Programs and Debat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6, No. 4, 1992, pp. 439-466。

③ Eugene R. Wittkopf, Charles W. Kegley, and James M. Scot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attern And Process*, 6th editio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72.

④ Jonathan W. Keller and Yi Edward Yang, “Leadership Style, Decision Context, and The Poliheuristic Theory of Decision Making: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2, No. 5, 2008, p. 688.

也没有通过假设检验,正如在模型 II 中的结果一样。本杰明·福德姆从动武的供给—需求角度指出,在美国考虑动武的重要性时,“不仅仅考虑动武的需求,还要考虑到动武的成本。……那些具有较低政治经济成本的方案更受总统青睐,由于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总统的支持率具有相互矛盾的供给—需求效应,对决策者使用武力的偏好上没有影响。”^①由于数据所限,我们使用的是月通货膨胀率,而经济增长率则是当年的数据,失业率为季度数据,对于具体某一时间的决策,参考意义不是很明显,这就降低了整个经济指标的解释力。

最后,我们对将所有的变量纳入到模型 V 中。我们发现了权力差异、政治体制、社会动荡、总统支持率变化以及失业率通过了显著性的检验。^②综合之前的模型,我们发现关于美国对外使用武力的 11 个假设,其中假设 1、假设 2、假设 3、假设 7、假设 8 得到了显著性的支持,而其余假设除了假设 5 和假设 10 勉强通过外,都没有通过检验假设检验。本文四个模型及其假设的检验结果总结见表-5。这样,关于美国动武的第一个解释模式和第三个解释模式都得到了验证,而另外两个模式没有得到我们的统计数据的支持。

表-5 主要假设验证结果总结

解释模式	假设	证实与否	说明
第一种模式 (现实主义)	假设 1	是	第一种模式的三个核心假设得到证实,现实主义解释模型因此得到支持。
	假设 2	是	
	假设 3	是	
	假设 4	否	
第二种模式 (帝国主义)	假设 5	否	第二种模式的两个假设没有得到数据的显著性支持,不能有效支持帝国主义解释模型。
	假设 6	否	
第三种模式 (理想主义)	假设 7	是	第三种模式的两个假设都得到证实,理想主义解释模型因此得到支持。
	假设 8	是	
第四种模式 (转移使用武力)	假设 9	否	第四种模式的三个假设都没有得到数据的显著性支持,不能有效支持转移使用武力理论解释模型。
	假设 10	否	
	假设 11	否	

^① Benjamin Fordham, “The Politics of Threat Perception and the Use of Force: A Political Economy Model of U. S. Uses of Force, 1949-1994,”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p. 584.

^② 总统支持率变化以及失业率没有在模型 IV 中,而在模型 V 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我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本模型中可能存在的交叉变量(总统支持率变化 × 失业率)的影响,这一点确如本文的匿名审稿人指出的情况。

五、结 论

本文对美国对外政策危机中使用武力行为的决定因素进行了探究。根据学界关于美国对外使用武力行为的四种解释模式,本文利用 ICB 中数据以大样本统计方法分别检验了这四种模型。我们发现基于政治现实主义思想,以权力和安全解释对美国对外使用武力的模式得到了有效的支持。同样,理想主义模式提出的民主因素也得到了我们数据的显著性支持,特别是危机另一方国内社会出现动荡时,美国总统更倾向于使用武力方式。对于帝国主义模式关于美国动武因素的经济利益驱动论以及转移使用武力理论强调的国内政治因素,并没有得到我们数据的显著性支持。

结合上文对这四种模型的梳理以及从表-5 中我们看到的检验结果,本文的研究结论基本上与以往的研究成果相符:关于美国对外使用武力行为的决定因素中,现实主义强调的实力和理想主义(自由主义)强调的民主等因素得到了有力的支持。一方面,不可否认,危机行为体的实力差异是美国总统考虑使用武力时的重要参考指标;否则,就无法解释冷战期间美苏两国为什么几乎没有直接军事对抗行为。“大国欺负小国,强国凌辱弱国”在现实主义者看来是这个丛林世界的基本法则,实力自然是最重要的标准了。另一方面,对于其政治体制相同的国家或者其盟国,美国在考虑使用武力解决危机时是相当谨慎的(二战后这种情况几乎不存在),而对于非民主国家的考虑则要简单得多,美国的对外行为常常冠以高尚的外衣,总不能宣称要在民主国家(或其盟国)内推广民主、自由、人权吧?正如上文提到在我们的危机数据中,民主国家数量超过了非民主国家,但一个事实是,这些危机事件包含的民主国家并非站在美国的对立面,它们要么是美国的盟国,要么与美国保持较好的关系,至少不是敌对关系。同时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我们研究的是二战后美国对外使用武力的决定因素,因此,冷战背景便成为一个很强的干预变量了,只是在本文中,我们无法将这一变量操作化,而它则可能会影响模型整体的解释力度。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同样发现了四种理论都有其存在其合理的某些方面,例如现实主义中的权力因素、自由主义强调的民主因素等在解释美国使用武力中的强解释力。

正如文章开始所指出,每一种模式均可以相互补充,美国对外使用武力行为的动机应该是多重的,但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是最重要的三个解释变量。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是研究数据的不完整性,特别是经济数据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在本文的所有模型中,经济指标几乎都没有通过显著性的假设检验,排除其本身的因果关系(规律),我们仍可以推断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我们数据的完整性有关。根据以往的研究结论,经济因素即便不是美国动武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针对这个问题,如果采用美国在危机当事国的投资额或者双边贸易额,也许可以部分地得到统计数据的支持。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

其次,决定美国动武因素很多,本文只考察了其中几个的重要因素,主要是因为这些因素可以通过量化方式操作化。但另一些因素也同样重要,比如总统的个性、认知信仰等微观层次的因素,然而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很难以量化的方式操作。例如理查德·赫尔曼(Richard K. Herrmann)和乔纳森·凯勒通过问卷调查发现美国领导人的信仰、价值观对于美国领导人使用武力确实具有影响^①,但如何以数量方式操作信仰、价值观确实是一大难题。

第三,本文回避了这些因素是如何以及通过何种方式影响美国决策者使用武力行为的讨论,我们的分析仅是基于结果的分析。这也是定量分析固有的一个缺陷:我们能够发现变量之间的因果性及其强弱程度,但是却不能通过定量分析它发现中蕴含其中的因果机制以及其作用方式。在对外政策分析中,如果建立一种既能将政策结果又能将决策过程联系起来的整合模型或许就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②如何解决这些不足,将是后续研究的重点。

^① 参考 Richard K. Herrmann and Jonathan W. Keller, "Beliefs, Values, and Strategic Choice: U. S. Leaders' Decisions to Engage, Contain, and Use Force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6, No. 2, 2004, pp. 557-580.

^② “多元启发理论”部分上完成了这一整合使命,但遗憾的是现在这种整合理论还不是特别成熟,其研究成果中也鲜有大样本统计分析的成果。对这一理论的最新介绍,可参考 David Brulé, "The Poliheuristic Research Program: An Assessment an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Progres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0, No. 2, 2008, pp. 266-293.

作者简介

巴里·布赞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蒙塔古·伯顿教授,哥本哈根大学和吉林大学名誉教授。

电子信箱: b.gbuzan@lse.ac.uk

张 锋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讲师。2004 和 2009 年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分别获比较政治学硕士和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曾任《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编辑。研究兴趣为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

电子信箱: fengzhangmc@gmail.com

陈 冲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 2006 级本科生。

电子信箱: nkchenchong@hotmail.com

刘 丰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2004、2006 和 2009 年在南开大学分别获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译著有《亚洲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2009 年)。

电子邮箱: liufeng00@gmail.com

王树春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1999 和 2002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分别获法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著有《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2002 年)、《经济外交与中俄关系》(2007 年)等。

电子信箱: wangshuchunf209@163.com

朱 震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电子信箱: 492765184@qq.com

吴文兵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士候选人。1999 年在电子科技大学获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学士学位 2007 年在新疆大学获国际政治专业硕士学位。

电子邮箱: wuwb07@mails.tsinghua.edu.cn

刘若楠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 2009 级硕士生。2009 年在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获法学学士学位。

电子信箱: liuruonan.crystal@gmail.com